

## 社会·历史·人心

——论路遥《平凡的世界》田福军形象的艺术塑造 □程 畅

“无论是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还是最基层的平民百姓,作家都对他们进行了笔墨饱满且细致入微的刻画。在我看来,这些人物形象的真正意义,实际已超出了文学范畴,而承载着人生教科书的意义。因为一部波澜壮阔的当代史,就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通过艰苦努力,通过改善自身不足,创造了历史奇迹,使中国重新跻身于世界之林的一部辉煌的奋斗史。”



中并不鲜见。作品相当成功地将这些人物的形象,与他们所处的大历史、大情怀,做了令人信服的勾连,从而勾画了这些人物的熠熠生辉的艺术形象。

## 三

无论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是放在中国当代史上,田福军、乔伯年的人物形象之所以立得住,不仅因为在他们身上深刻体现了“社会·历史·人心”的历史内涵,而且还因为路遥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投入了自己极深沉的思想感情。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路遥不单是他所亲历的新时期农村历史的叙述者,与此同时,他也是中国“当代史”的“同代人”。

路遥的童年,是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度过的。因为家贫,他被父母送给大伯大伯母赡养,深切经历了一个成长中的农村孩子心理的贫穷和自卑。这段独特经历,决定了他要以一己之力,奋力写一部反映这场伟大农村变革的长篇小说,但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部长篇小说场面宏大、视野深远,既写到中国社会上层,也写到社会下层民众,各种人物无一遗漏。无论是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还是最基层的平民百姓,作家都对他们进行了笔墨饱满且细致入微的刻画。在我看来,这些人物的真正意义,实际已超出了文学范畴,而承载着人生教科书的意义。因为一部波澜壮阔的当代史,就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通过艰苦努力,通过改善自身不足,创造了历史奇迹,使中国重新跻身于世界之林的一部辉煌的奋斗史。

难能可贵的是,路遥在塑造田福军的艺术形象时,并不一味地追其高大上的一面,也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他来自人民和服务于人民的平凡朴素的一面。就像后来跟他做秘书的白元看到的:他作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像个‘大官了’,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像个公社干部。作为秘书,白元断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田福军太没架子了!太随和了!这哪像个地委书记?”我想说正因为如此,路遥和他的小说,才真正融入到社会和人心之中,成为伟大历史的一部分。

他先是与这位老搭档思想沟通,遇到阻力后,机智地利用了全县“煤油断货”这个偶发事件;与此同时,把他曾经批评过,经过帮助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力主改革的年轻干部周文龙提拔为县长,绕过有智大胆实施他所设想的,在原西县的大河川搞一片“谷子方”的计划。值得提到的是,像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的改革文学一样,路遥在塑造思想解放的党员干部形象时,既注意描写他们思想开放的一面,同时,也表现他们在具体工作中的谨慎和老练。把大胆推进改革,与深谙中国国情的成熟的思想,做了巧妙自然的融会贯通,从而使人物塑造更加真实、饱满和生动。

在先行一步推进农村改革的领导干部田福军身上,“等不得”的思想是自觉而强烈的。这一方面取决于他积极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观念意识,同时也与长期以来农村错误政策所导致的贫困落后状况,有直接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跨越现阶段条件的急躁情绪,冒进实施“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化”的政策,严重干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农村各方面工作积极健康的发展。就像田福军十分欣赏的农村基层干部孙少安,对他大胆进言的那样:“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借助这席话,《平凡的世界》一针见血地剖析了新时期农村改革历史遗留的问题。这种思想精辟的分析,还为田福军的改革观念,做了充分的思想逻辑铺垫。同时,也深化了作为改革者的田福军的思想内涵。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种思想见识在一般的农村题材小说里,其实是不常见的。

在田福军之外,省委书记乔伯年是另一个路遥成功塑造的改革者形象。从北京到陕西上任伊始,作品就剖析了他的心理活动:“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也许是最好一次为国为民效力大力的机会了”。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像乔伯年这样的好干部是为数众多的,他有先见之明地大胆提拔任用田福军的工作事例,在现实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新时期初期,万象更新,全社会充满了蓬勃生气。邓小平倡导的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政策深得人心,一时间,许多年轻有为、受过专业教育的优秀干部被破格提拔,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崭新力量。

在上世纪70年代灰暗的历史隧道里,田福军就萌生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他深入农户,从糠团子里敏感发现断粮问题,打开集体粮仓救济贫困农民。当省委赋予他历史重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其他地区一步积极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这当然会在黄原遇到极大阻力。首先是副专员高凤阁反对,他还串通地委苗凯书记,希望由此制衡福军。而社队一级的阻力,则来自他他哥哥田福堂这种思想观念保守的基层干部。然而,以孙少安为代表的广大农村群众,则是热烈欢迎拥护这一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好政策的。

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场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政治上老练的田福军立即回应道:像黄原这种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会有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然而,田福军家乡双水村的一队正副队长孙少安、田海民,站出来支持他了!当福堂和大队领导企图设置障碍时,他们立马把生产队土地承包到户了,而且还照顾到岁数已大,缺乏劳动能力的老领导田福堂,把他放到本组里来帮扶。

通过上述场面,路遥把农村改革开放的全景观描写,从黄原地委层面,推进到农村最基层一级组织——生产小队的历史活剧中,从而生动表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生机勃勃的历史场景。

忠实执行“为人民服务”宗旨,同时熟悉党内生活的田福军,对老领导苗凯表示了极大的尊重,赢得他的默许,同时巧妙地做起了当年工作老搭档、现为原西县委书记张有智的思想工作。

剧和古典小说中的若干文体上的特色,企图从艺术上避开现代资产阶级生活的软弱无力,不成体统的样子。”这正是批评家雷达所指出的:“《平凡的世界》是一幅巨型的、动态的图画,一切都在或急速或缓慢地转动着,应当说,小说截取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这个时段是很有眼力的。这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一个对于我们民族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的时期。”(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1975年到198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曲,也是决定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十年。路遥以杰出小说家的历史敏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性情节”、“必要的东西”,予以形象化的表现。而批评两个公社无理捆绑做小生意农民的艺术描写,就是抓住了历史变革的某一瞬间。这对于经历过这些变革事件,包括我们虽然没亲身经历,然而在各种书籍中能读到类似叙述,从而产生了一种历史亲近感、并深为这一变革而激动的后代读者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

《平凡的世界》还把改善党群关系的一幕,放到田福军在后子头公社看到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上。熟悉农民,并对农民怀着深厚感情的作家路遥,可以说做到了细致入微和具体生动的程度。

福军在土崖凹村队长家,刚拿起玉米馍吃午饭,发现这家六个孩子挤在门口眼馋地看着他。他忽然发现这黄馍上沾了些黑东西,到锅里一看,那里全是黑乎乎的糠团子。他放下黄馍吃完糠团子后,马上召集后子头公社20几个大队书记开会,劈头就问:你们直接说,哪个队有断粮的!“许多书记都哭开了。”田福军立即冒着生命危险,打开队里粮库,把粮食分给缺粮户。这一典型情节,曾经被作家张一弓写到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成为被文学批评界反复评说的一个“关键性情节”。小说以它一向情感饱满的笔墨,描写了田福军的内心活动:“田福军虽然坐在了飞驰的吉普车里,但他的思想还在后子头公社。通过这次匆匆的调查,使他认识到,‘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农村贫困的局面依然如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这里,路遥替县里田副主任写出了他心里最隐痛的东西。从另一角度看,他也是借这支笔,写出了他作为农民之子的内心的隐痛。在这一点上,路遥作为“亿万农村青年”的“代言人”,真的是受之无愧的。

## 二

由于有长期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作为领导干部的田福军,最懂得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内涵。在贫困中苦熬的黄原地区民众,冀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政策,得以大胆推进和实施。路遥不失夸张地描写了福军初任黄原地区专员时的“田旋风效应”: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

## ■评论

## 寻常的,拒绝拔高的

——为张羊羊《草木来信》 □翟业军

喜欢梅花,说不出的感觉,没叶子的花看着老别扭的。”他当然知道,梅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意义系统,于是,他把这个意义系统(“梅妻鹤子”“六大古梅”等)连根拔起,让它们衰竭,露出苍白的、一如俗物的面孔。梅的神话一破除,梅之“傲”也就成了虚张声势,底子里竟只是势利,而现世里的梅园就更显得多事了,于是,他批评村子里一个暴发户的营造梅园之举:“‘傲梅园’这个名字取得一点也不好,就像那个长大了的孩子满脸的傲气。”张羊羊当然清楚,拒绝梅,不只是在表达对于某一草木的好恶,更是一种文化姿态的大声宣告:我是要跟整个“比德”传统决裂的,因为梅居于“比德”的核心处,它一脑门子想着“只留清气满乾坤”,所以,拒绝“比德”,从拒绝梅开始。行文至此,我猜,有些读者开始焦虑了:如何想象与“比德”了无干系的满纸草木?没有骚人墨客的自我投射,只是作为自身而存在着的草木又有什么意义?是的,作为童话诗人的张羊羊哪里懂你的劳什子意义,他的迷离醉眼也无力穿透对象去追索意义,他更要小心翼翼地清理掉意义的杂质,冲破梅兰竹菊的围困,放自己奔向长满了寻常草木的大地。因为醉了,他的步履是踉跄的,会摔倒的,摔倒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里是草莓,那里是菱角,每处都是一个浆果的梦,够他稳稳地度过他的今生了。

好了,说到寻常草木了。所谓寻常,就是不寒、不萧、不萧、不是可爱而是可吃、不是可思而是可用的,满溢着人间烟火气的对象。不,不是对象,因为我与它没有距离,它补充着我,它成为着我,而我则长养着它,照料着它。千万不要以为烟火气单单是温暖的、明净的,它也可能是湿的、呛鼻子的,就

像我们走过一片碧绿的菜畦,正在赞叹成行、成垄的青菜的喜人,一阵风过,却飘来一股刚刚浇过的粪水的微臭。张羊羊正视着烟火气的湿和微臭,他知道,回避了它们无异于另一种拔高,他更知道,湿和微臭是烟火气的刚的、韧的部分,正是它们使得烟火气有力量从亘古绵延至当下还要飘向渺茫的未来,也正是它们让烟火气有了鸢飞鱼跃、随风自俯仰的灵动,一如“一庭春雨飘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欢喜。

张羊羊太珍视寻常草木之寻常了,拒绝所有形式的拔高。于是,他耿耿于怀于沈从文说淡然的“格”比土豆高,在他看来,“格”正是“比德”的残留,寻常草木何“格”之有,有的、重要的只是茨菇的清苦味和它的就像是一个“安静的孩子”的外形:“胖胖的,圆圆的,尾巴是粉红色的。”拒绝拔高,就不是把我投射向草木,而是让草木朝着我诉说,朝着我打开它们所有的隐秘,我也在此打开中被深深地改造,我变得谦卑、怯懦,我是如此的感恩——不是一个谦卑的我,如何听得到草木的低诉,更何况正值一个马达轰鸣的钢铁时代?

正是在此意义上,张羊羊给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草木“来信”,他既虔诚又沉醉地一一展读;也是在此意义上,张羊羊称自己的写作是一种“生态文学”,因为生态的第一要著,即是那个嚣张、跋扈我的退隐。我还想加一句,张羊羊的写作又是人道的,这里的人指的是寻常人,因为寻常草木也是寻常人的恩物。想起郑彦的一段家书:“天寒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我想,寻常草木就像一大碗炒米,正是“暖老温贫之具”,张羊羊的写作亦可作如是观。

## ■新作快评 南翔短篇小说《伯爵猫》,《芙蓉》2021年第2期

## 在都市生活中栖息与飞翔

□欧阳德彬

南翔是一位执迷于日常观察的小说家。短篇小说新作《伯爵猫》有他小说的一贯特点,也有一些新的掘进。南翔是场景描写的圣手,小说讲究画面感与舞台效果。他之前的小说《绿皮车》精心勾勒即将消失的一趟慢车,反映世道人心,如今的《伯爵猫》细描描绘了城市一间即将歇业的小书店,折射出都市的芸芸众生。

爱情,可以说是一种至死方休的对生的赞许,是小说叙事永恒的追求。伯爵猫书店关门的前夜,女老板、店员、电工以及一千书友到场,各色人物的生活与情感在此夜交错与延展。女老板娟姐的神秘情人,生活在他城却从未出场,谜团一样回荡在书友们的言谈中,还有她与律师之间难以言喻无疾而终的情愫;一对职场男女在伯爵猫书店结缘,很快发展成情侣,过上了二人生活,不再来书店,书店的宿命却拓展了人生的另一页风景;店员阿芳在娱乐城上班的阿元,他们的爱情也面临着困境,阿芳担心阿元受到夜场风气的熏染而变坏;来书店修理灯箱的电工,言辞之间透露出是一位在城市里吃喝嫖赌酒脱不羁的主。缤纷的情感集中在书店“歇业典礼”上书友们的言谈中呈现,小说家言,自然不必当真。

小说中书友们讲述的情事,是在虚构文本中的另一重虚构,书店情事便产生了影影绰绰、真假假的艺术效果,拓宽了想象的空间。小说写作如同作画,太写实太确凿反而会减损艺术真实与审美想象,南翔深谙个中奥妙,尤其是书店女老板娟姐的爱情书写,几笔带过,看似浮光掠影,却又草蛇灰线,这位以书店为情人的都市女性的个性追求,令人欲窥而不能物其快,留白很多。读后不禁心生疑问,这位开了16年书店的女人,到底经历过什么。

有些书店情事,如同小说中回荡的歌声《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中的描述:“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骆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小说中,南翔再次将舞台场景艺术与隐喻象征手法娴熟地结合在一起,在现实土壤散发人间烟火气的同时,于精神和文化的维度一并飞升。单从命名艺术上,看“伯爵猫”,这是一只有着贵族气质的猫,可以类比繁忙现代都市中依然保持读书习惯的“精神贵族”。此猫也确实个性十足,只有在娟姐发令或者新顾客来临时才施展绝技:“倏然窜上二楼,从窄窄的廊檐边慢慢探出身子,将背脊蜷成一柄张开的折扇,四角踏在一条线上,千钧一发之际飞弹出悬梯,轻巧地落在一楼的案台上”。夜幕深深,娟姐将书店的灵魂“伯爵猫”送给了店员阿芳。书店歇业,猫也送人,让人情何以堪?然而结尾书友们的一个不约而同的动作,为伯爵猫书店留下了温馨而耐人寻味的一笔。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形象的艺术,也是语言的艺术,《伯爵猫》更能看出旧学根底对南翔小说的影响。比如小说开篇,“今年的冬天有点冷……阿芳从春潮鞋店出来……不到七点,天就黑冷了……”稍微对文字敏感一些,就不难感受到其中古典白话小说的味道。南翔以往的小说,要么塑造人物沉沦历史,要么虚构场景寄托既往,较少以自己寄身的城市深圳为背景。新作《伯爵猫》却是一篇地道道的深圳背景小说,人物也呈现出某些深圳特质,五湖四海之人背负着自己的故事汇聚于此。这似乎昭示着,他开始在写实和虚构之间,在过去与当下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